

1925年阴历二月初六,我出生在江苏省灌云县(现响水县)上兴村一个富裕家庭。父亲李开贵,在村里辈分高又读过书,村里发生什么纠纷,都请他去做仲裁。母亲史凤林,出身贫寒,文化程度不高,但她身上具有许多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。在家族里,她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,支持革命,并为党组织递送情报。

13岁那年,母亲不顾父亲和叔叔的反对,送我到村外的洋学校里读书。在那里我开始接触到共产党,并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。校长吴强珊是中共地下党员,高年级同学中有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。不久校长的身份暴露,被迫撤离。国民党政府派来的新校长是个国民党员,我们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新校长展开了斗争,最终校长被撤职,学校也解散了。

后来,母亲又安排我到三岔口一所私塾读书。学校离家很远,要过一条河,我只能寄宿在舅舅家里。慢慢地我发现了母亲的秘密——为地下党送情报。由于我在外面上学,母亲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就有经常外出的理由,方便她开展工作,我也有幸成了母亲的小通讯员。长期寄宿在外,培养了我的独立意识和生活能力。1940年8月乘秋季开学之际,15岁的我在母亲的帮助下毅然参加了革命,成为新四军的一名女兵。

机智的侦察员

刚当兵时,我在新四军老3团孙茂荣同志领导下,在涟东县三区做招兵工作。1940年底,部队准备举办敌工作训练班,第3师8旅敌工科刘能毅同志负责在黄圩一带招生。三区区长薛位伍同志知道我有过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工作经验,对敌占区情况比较了解,就极力推荐我去参加培训。他和警卫员戴振球同志亲自把我送到甸湖集中地新荡。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同志宣布敌训班正式成立,刘能毅为班主任。敌训班是培养侦察员的短期训练班。3个月外,对我们实行全封闭管理和训练,白天不准外出,只有晚上天完全黑了才允许几个人结伴出去散步,主要是怕暴露身份。经过紧张的学习,我们知道了怎样开展情报侦察工作,掌握了化装混入敌营、主动接触对手以及收集、隐藏、传递情报的技巧。同时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日语,便于开展反战宣传。

1941年夏的一天,我进响水城侦察日本鬼子的防务。当时鬼子在城里布防,所有进出城门的人都要接受严格检查。我是天黑以后从驻地四大门出发的,走到离响水城几十公里的大庄已是深夜,我就躲在庄外的大桥底下过夜。清晨,天刚蒙蒙亮,有几辆牛车拉着草从桥上经过。我赶紧车人不注意,轻轻地跳上最后一辆车钻进草堆里,顺利地混进城。侦察任务很快完成了。当时,我们经常印些传单、标语,有机会到敌占区活动时就乘机散发出去,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、鼓舞老百姓的斗志。完成任务,我照例向城外撤退边散发传单。我还没出城,鬼子就发现城里有新四军的传单,顿时哨子声、喊声连成一片。鬼子集合队伍,端着枪挨户搜查,把人赶到街上,企图找到传单的来源。趁着混乱,我迅速地观察一下地形,离开出城最近的路线是一齐开闸的。我想反正是一死,跑得了就跑,跑不了也能把鬼子引开。我拼命地冲过去,到跟前才看清前面是鬼子的电网。此刻鬼子也发现了,我边开枪边向这边集拢,子弹嗖嗖地从我耳边擦过。我来不及思考,全身扑向电网,以最快的速度翻过电网继续跑。直到人声、枪声渐渐远去,我才感到右胳膊剧烈地疼痛,原来被铁丝网扎破了,一直在流血。事后医生告诉我,胳膊断了一根神经。至今我胳膊上还有一处疤痕,周围还是麻木的。30多年后我故地重游时,与当年的游击队员老陈聊天,说起这件事,他兴奋地告诉我,那天他就在那里。事后他带了四个人在电网外查看,发现了血迹,担心受伤的新四军跑不远,需要帮助,就顺着血迹找出去一公里地。多年来他一直惦记着这位同志的安危,现在总算可以放心了。

还有一次,我带着年仅13岁的倪学富从驻地王庄往响水城侦察敌情,我装扮成富家少爷,小倪扮成随从。我们俩在路上走着,突然看到一队日本鬼子大约60多人迎面走来,躲是来不及了,而且容易引起注意。此刻,在鬼子与我们之间有一大户人家出寨,正在举行路祭。我急中生智让小倪赶紧向司仪通报,说薛五太爷家的小少爷来送祭。薛五太爷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地主,家里妻妾成群,儿女众多。我在私立学校时曾和他儿子同学。果然,我冒充他家少爷,这户人家觉得很有面子,得意而没有怀疑。司仪提高嗓门:有请薛五太爷家小少爷。我大步流星地上前,故意把祭奠的动作放慢,又多加了两个礼节。这工夫,鬼子与路祭的队伍擦肩而过,我们顺利地化险为夷。

十九元钱和九套棉衣

我从新四军8旅对敌工作训练班毕业后,组织上给我分配了一群12岁至15岁的小鬼,年仅16岁的我就成了孩子头,带领这群小兵活跃在涟东县主要的敌占区新安镇、响水口、三口一带。当时战争打得很残酷,有时候只能靠发霉的豆面和地瓜干充饥。到了深秋,我们9个小鬼每个人身上只有一件单衣。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,大家也从来没有抱怨过,一听说有情况都想进城去侦察。我们经常化装成卖鸡蛋、卖烟卷的小贩,混入敌人军营。我年龄大点儿,曾经女扮男装,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商人,陪国民党军官太太打牌,以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规律和行动计划。

有一次,我在响水口完成侦察任务后,返回驻地时准备顺路侦察三口南边敌人一个据点的情况。不料途中突然碰上那个据点的敌人出来活动,大概有一个小队。当时敌人距离我有100米左右,情急之下我发现南面不远处有一个庄子,就装作若无其事地进了庄。看到有户人家开着门,很多人正在打麻将,我见没人注意我,便进去将随身带的手枪和侦察时绘制的地图藏在放猪食的木墩下面,然后挤进人群和他们一起打麻将。敌人好像有所察觉,到处看着,但没发现什么异常。他们有些不甘心,在门口设了一个岗,派人把守着。我知道一时无法脱身,索性坐下来,安心打麻将。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,敌人见没动静,才撤走了。看着敌人走远了,我抽身从人群中出来,到木墩下面取出藏在那里的东西。当时在侦

讲述

峥嵘岁月再回首

——一位新四军女兵的抗战故事

□李春华

察工作中,经常发生类似的插曲。

由于我们工作成绩显著,经常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。一天薛位伍区长来驻地看望我们,发现我们9个小鬼穿着单薄,一个个冻得脸色发青,有的还不停地咳嗽,流鼻涕。薛区长心疼地看着我们,沉思了一会儿,忽然眼睛一亮,对我说:“有办法了。明天黄克诚师长在北沙召开部队和地方的干部联席会,到时候你就说有情报要直接交给黄师长。只要你能想办法进入会场,我就可以帮你们向黄师长反映一下情况。”

第二天我如约赶到会场。看到我进来,薛区长马上向黄师长介绍:“这是李恒甫(后因革命需要改名李春华),她带着一个小鬼在搞情报,工作完成得很出色,就是条件太艰苦了,快过冬了,都还穿着单衣。”黄师长看了看我身上的衣服,给我开了一张便条,上面写着:请涟东县政府二科发给李恒甫同志19元钱,以置办冬装。怀揣着黄师长写的便条,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只是我百思不得其解:为什么黄师长批给我的是19元钱而不是20元钱呢?

领到了黄师长批给我们的钱,大家兴奋地聚在一起商量做棉衣的事,算来算去都不够每人做一套。倪学富的母亲刚好来队,她说可以到当铺买那些过期没有典当的衣服,回来拆洗再重新拼起来做冬衣。后来我又从当地比较开明的土绅家里要了一些旧棉絮,旧棉被胎。这样,经过一番东拼西凑、缝缝补补,每个人都开心地穿上了棉衣。

后来,我们了解到,黄师长特别会过日子,咱们3师的余粮足够全师吃3年。我想,也许黄师长认为19元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用多想,这19元钱是师长在教育我们要精打细算,要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。

战利品自行车

1942年秋天,部队精简整编,连长李夏军和我被推荐到抗大五分校学习。我去了才知道那期不收女生,只好转到苏北区党委党校。

在党校学习期间,学员们对我这个小妹妹都很照顾,干活时就让我看家。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,我们听完报告回来,我突然感觉有些异常,凭着做侦察兵的经验,发现驻地的门上被做了记号。我立刻报告校部,校部请示区党委决定学校立即分散、全体撤离。支部书记找我谈话,要我负责带领全组同志及,身穿安旅行团的一个小队转移到阜东县。书记说:“你搞过情报打过仗,有实战经验,组织上相信你能够完成好任务。”我们刚走两个小时,学校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攻击,若不是发现及时、行动果断,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
1943年春,我调涟东县原定还搞情报工作,领导认为我已经被敌人悬赏过两次,不能再做这个工作,因此被派到保护税务局的加强排。后来这个排合并为涟东总队6连,我任支部教员。在一次转移中,指导员周新雨牺牲了,我接替了他的职务。这一年夏秋之际,有一次我带几个侦察员在涟东县与淮安县的交界处执行任务,在接近一个村庄的时候发现有情况,我们便埋伏在青藤里观察,看到有六七个鬼子从村里抢了东西往回走,其中有个人还骑着自行车,我和侦察排长一商量:“打!”我们一开火,鬼子扔下自行车窜进路旁茂密的高粱地跑走了。这里离鬼子的据点不远,我们没有再追去。

这辆缴获来的自行车经连长王六一同意,交给我使用。这是一辆黑色的小自行车,车体不高但很结实,龙头下面突出一个红色的“满”字。有了这辆车,我行军打仗、侦察敌情、运送伤员和物资,就更方便了。军区参谋长钟玉祥要用他的小青马换我这辆。我说:“不行,马要吃草,还是车好。”遇到下雨或路况不好不能骑车时,这辆车就被战友们抢着扛去。不管是谁拿走了,到了第二天早晨集合时,这辆车总是被擦得干干净净放在场院的一角。曾经有几次因环境不允许而把车暂存在老乡家,几经周折后车又回到我身边。车龙头下面有一处焊接过的痕迹,那是1958年我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时,一次下乡参加修水渠的助民劳动,通信员小王借我的车运送物资时不慎撞断的。

几十年来,这辆车陪伴着我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、社会主义建设。如今,它静静地停放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第六展厅内,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,被定为国家文物。1989年7月,电视片《话说长江》的日方总编导佐田雅人先生在参观纪念馆时,看到了这辆自行车,就向纪念馆工作人员询问车的来历。听完介绍后,他说:“这辆车我骑过,当年是我把它丢掉的。”他找了馆长,想用任何国家造的任何车子换回这辆车,我们国家的战利品当然是不能交换的。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,中央电视台和国家档案馆联合摄制了10集大型文献电视片《新四军》,在第四集“弯弓射日”(下)中,我和佐田雅人分别接受了采访。

虎口夺粮

1943年,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。8月,我受组织派遣到盐东县一区陆舍乡担任指导员,与乡长白东香、中队长夏恒忠、副队长许怀良等同志一起工作。当时仅盐东县就有日伪军据点18个。10月,敌伪赵云祥部120余人占领了陆舍乡的刁陶油坊,并在四周筑起围墙,建立了据点。新建的这个据点离我们的粮仓仅400米。区政府指示我们:趁敌人立足未稳,立刻组织群众将粮食转移到距离陆舍乡10公里外的四区小闸口。

这次行动大约需要400人同时参加,我们陆舍乡组织民工180人,邻近的大友乡支援200人。那天晚上大约7点钟,天刚刚黑,我们大队人马就悄悄地向粮仓进发。在预定地点,大友乡民兵中队队长沈仲尼同志带领200名民兵、民工准时与

我们汇合。沈队长带着大友乡的几个武装民兵,作为尖刀班走在运粮队伍的最前面,我迅速带人靠近土围子,埋伏在墙外观察敌情。

几百人在黑暗中拨开荒草快步行走,没有一个人掉队。粮食一层一层地很快打开,粮食一斗一斗地从里向外有序地传递出来,接到粮食的人迅速地将粮食挂上扁担,挑上肩。几百人默契地配合着,如同一个人一般。当所有的粮食都上肩后,指挥员轻轻地说了声“撤”,所有人按事先的安排,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撤离现场,向着四区的方向飞跑。虽然每个人肩上挑着50多公斤重的担子,有的个子瘦小,有的年老体弱,但此刻大家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那就是“快跑”。从开仓到粮食上肩,几百人的行动只用了不到一小时。

“队伍开始撤离了。”接到通信员小潘的通知,我们几个埋伏的武装民兵也慢慢地从围墙边撤下来,跟随在运粮队伍的后面继续掩护。刚走出不远,日伪军大约一个排兵力的夜间巡逻队从我们队伍左侧经过。大家立刻停下脚步,屏住呼吸,让他们过去。又走了二三里,这支巡逻队在转回据点的时候发现了我们,他们是听到了声音。几百人挑着粮食浩浩荡荡地走路,声音肯定是越来越大。天黑还下着雨,敌人搞不清虚实,先开了枪。我和几个武装民兵为了把敌人吸引过来,也开了枪。我当时用的是二十响手枪,民兵们共有五六条步枪,一起向敌人开火,再配上“土机枪”(即在铁桶里放鞭炮)的声音,一时间枪声大作,火光划破黑夜,敌人被吓住了。我立刻用日语喊话:“我们是新四军,缴枪不杀,优待俘虏!”敌人见我们火力很强,又有陆军翻译,以为遇到新四军主力部队,不敢恋战,仓惶向据点撤退。

为了不给人喘息和思考的机会,我命令大家追着敌人继续打,一直追到据点围墙外。我们和敌巡逻队在外面一交战,就惊动了据点里的敌人。当敌巡逻队靠近时,他们以为是新四军冲上来了,就一齐开火,枪声淹没了敌巡逻队的喊声。看到敌人自己开火了,我们开心地笑了。我一声“撤”,大家放开腿跑,追赶上运粮的队伍。敌人后来发现打的是自己人,但因为搞不清我们的底细,只能惊魂未定地躲在据点里。

运粮大军群情振奋,斗志昂扬地把2万公斤粮食一粒不少地运到了目的地,行动中无一人伤亡,圆满地完成了虎口夺粮的任务。

初飞的海燕

1944年底,我结束了在盐阜区整风队的学习,盐东县委派我去开辟海员工作。下港、黄家尖一带是苏北最穷的地方,地广人稀,常年战乱、灾荒,民不聊生。为了尽快进入角色,我深入到各家各户,掌握海员生活的第一手资料。为了方便与海员联系,区委又派了位姓蒋的党员同志来协助我工作。

我们首先在海员中建立了海员工会组织,召开全体海员大会,制定了《海员工会章程》,选举出了工会会长和委员。会长由海员中的积极分子蔡西康担任,董史平同志(县委委员)是主任,我是指导员兼秘书。

我们通知所有的船主,在规定时间内船只必须进港维修、登记,没有达到安全标准的一律不准出海。我们把海员分队组织集训,每个队都建立了由各区委抽调来的干部。经过近一个月的集中培训,我们在海员中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,发展了几十名共产党员。从此,每条船上都有了党员和群众骨干。不久董史平北上开辟新的工作,由我接替他的工作。

我们海员工会与船主的组织“渔业公会”共同商议,成立了海员救济委员会,我作为海员工会的代表出任主任,开明船主卞良伯任副主任。海员工会在黄家尖买了6间民房,用于办公和存放救济物资,工会工作很快步入正轨。

在与海员们交往中,我和他们及其亲属结下

了很深的感情,取得了他们的信任。我决定破除迷信,出海打渔。我选择了一个气候适宜、渔汛到来的日子,第一次上了一条党员和骨干力量较多的船,和海员们一起摇橹出海、撒网打渔。这次出海的渔船上,数我所在的不忌渔船捕鱼最多。从此,这一带的渔民再也不会忌讳女人上船了,他们甚至把我们当成渔船上的福星。

海员工会成立前,海防团和渔业公会经常指派“公差”,这种无偿摊派严重损害了中小船主和海员的利益。为此,我们工会派出一名委员与大船主、渔霸武装——海防团交涉,海防团团长袁国祥扣留了这位委员和船只。我们报告了县委,县委通知当地有关部门,组织民兵协助海员敲锣打鼓地进港,阻止海防团封船。在强大的攻势下,海防团不得不放人、放船。这件事后,海员工会名声大振。

那时,新四军中药品奇缺,很多伤病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丧失生命。工会的海员们知道后,利用出海运货的便利条件,冒着生命危险到上海、南通等地购买药品,千方百计地躲过敌人的搜查,将药品安全送到新四军手里。

1945年上半年,盐阜区召开海员职工代表大会,我们盐东海员工会选派蔡西康等5位代表参加,蔡代表与黄克诚师长同坐在主席台上。黄师长与代表们亲切交谈,认真聆听了我们的工作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。这批在工会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党员和骨干力量后来参加渡江战役,立下了不朽战功,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划着木船,送百万大军过长江,解放全中国。

弯弓射日的女兵

1946年夏,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基本结束,我奉命调回部队,从盐东县住苏北区党委转关系到第10纵队。我在去30旅报到的途中,正好遇到我军大部队转移。在陆续通过的部队里,我又巧遇30旅组织科科长高成贵同志,他给我写了介绍信,要我到30旅卫生部队任支部书记。当天旅卫生部宋超副部长召开全体同志会议,介绍我调来做党的工作兼支部书记。后来,卫生部又成立了党总支,在各医务队成立了支部,我任总支书记。

不久后的一天,旅部派骑兵送来紧急命令,要卫生部组织医疗队,到前线抢救伤员,75公里路要求在第二天拂晓赶到。原先宋副部长让医务一队王指导员带队。但我强烈要求去前线并且安排伙房做饭。吃过饭后,我就宣布自己负责带队,并号召大家报名。医疗队历经惊险,顺利抵达目的地刘家庄。

医疗队人员休息片刻,紧接着前线送来150多名伤员。后到的同志脚还未落地,就投入紧张的战斗。这时敌机飞来,伤员来不及进屋,只好就地用草堆上的草盖在伤员身上作伪装,敌机轮番扫射,工作人员只能躺下盖上草伪装。幸好全部人员无一伤亡。敌机飞离后,我们就抓紧在老乡家用白洋布搭起手术室。由邵荣光同志主刀,助手、护士配合,该动手术的伤员都动手术了,该换药的、包扎的伤员也全部处置了,这时已是下午4点钟。

就在此时,旅前线指挥部传来命令,要我们带着全部伤员向后方转移。我们一直走到深夜,到达射阳县和阜宁县交界处的一个大庄子。拂晓,我们刚出庄子,就在左侧发现了骑兵。我叫王申带队快走。我和陈明功把警卫班分成两队,陈掩护大队人员撤退,我把敌人引开。等我们把一切准备好,天更亮了。看到骑兵后边没有队伍,我想肯定是旅指挥部派人找我们的。果然是参谋派人找我们来了。我们几经周折到达了目的地,将伤员安全交后方。

1947年初春,我调到苏北军区特务团任民运股干事,主要负责解决部队伤员安置及民运宣传工作。有一次战斗中下来60多名伤员,其中有我团40多人,还有别的部队20多人。我们计划将这批伤员走水路送到后方医治。就在伤员都已上船准备出发时,一个骑兵快马跑来报告,河道已被敌人封锁。所有伤员只能上岸从陆路转移。我立即集合所有人员讲明情况,决定:轻伤员由工作人员扶着步行,稍重伤员骑马,重伤员用担架抬。我正准备到附近村子里去组织担架,又一个骑兵从后面赶来报告:“团长要你们带着伤员迅速撤离,团部已经被敌人包围,正准备突围。”这时,忽然发现正前方有我们的部队经过。我骑车迅速赶上前去,找到部队领导汇报情况。

部队领导听后,立即命令部队调转方向去陈

家解解围,并让我安心去搞担架。我脱下军装,直奔村庄。地方干部很快来了,群众都非常热情。绳子不够,他们就吧腿上的绑带解下来用;担架不够,就把棉被的四个角捆在两个棍子上做成担架;所有能找到的扁担、木棍都用上了。一切安排完毕,我让张一平先带全体同志出发,我留下检查是否有遗漏的人员。

队伍走后,我在一片草从里,发现一个个子很高的伤员躺在那里。他耳朵后边中弹了,头肿得很大,既听不见也看不见,队伍离开时他完全不知道。幸好我的自行车车架特别牢固,我用尽全力想把他弄上车去。但他太重了,弄了几次都滑了下来。最后我把我的皮带和他的皮带都解下来绑到一起,终于他滑不下来了。但他无法骑上车,只能推车前进。到了深夜,我已经筋疲力尽了,就躺在路旁的草地里睡一会儿。

天亮后,我遇到一位侦察参谋带两名侦察员,他们告诉我,敌人离这里还有两公里,让我赶快离开,给我留下一位向导便离开了。这个向导住在附近村子里,儿子是我们团2营的战士。他向我打听他儿子的情况。我一听,马上让他别管我,赶紧回家戴好军属证。我继续推着伤员追赶队伍,推了很久,我遇到华中指挥部警卫营。我急忙把车子架好,把伤员放好。此时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,但还是坚持找到营长戴振球,请他把伤员安排好(这个伤员后来与我在鸭绿江畔重逢,我们相约胜利后再见)。

戴营长立即叫人安排伤员,同时指着我说:“你的脸色很难看。”我手拍在胸上说:“这里边好像在响。”他命令部队原地休息,叫军医吴坤跑步前来。医生过来检查我的情况,说要“炸肺”,马上到老乡家要了盐,弄了两大碗盐水让我喝下去,响声暂时止住了。夜里3点,连以上干部去听管文蔚司令员报告。我一起身就大口吐血,卫生队张一平队长马上带着药和医务室大夫孙山林同志跑步赶来,迅速进行抢救,打了好几针止血剂,血仍然止不住。我偶然睁开眼,看见他们神情很紧张,面部表情凝重,最后血总算止住了。当时我爱人看见医务人员都在场,他帮不上忙,就去听报告。途中王树楷参谋长和朱敬德团长得知此事后,命令他立即返回。他快马加鞭往回赶。我这次吐血量多到几乎无法抢救的地步,抢救现场满地是血。第二天我转到卫生队继续治疗。

那年秋天,部队自清江外圩回准备打仗。朱团长派一个骑兵另带一匹马到卫生队找张一平队长,说:“部队要打仗,急需担架,团长让李春华负责组织,完成任务后再回来休养。”勤务兵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我,我丝毫没有犹豫,立即骑上带来的马归队。

离部队还有1公里地就听见集合号,我快马加鞭跑到朱团长面前向他报到。团长说:“好,来的正是时候。”我接上通信员送来的自行车,换上便衣立即开展工作,半天工夫就弄到30多副担架。团首长很满意。没想到第二天晚上,我咳嗽了一声又大量出血。王参谋长让卫生队用担架把我接回去抢救,又休养半个多月,身体才逐渐好转。

有一次部队行军,刚到一个大庄子停下休息,我突然听见隐隐约约传来的飞机声,连忙喊:“大家赶快进屋隐蔽,飞机来了!”我和挑夫赵广科离房子较远,只好就近躲进一个矮高粱棚里。刚进去,飞机就开始扫射。我猛然觉得头上被什么打了一下,心里一惊,连忙用手去摸,没见到血。赵广科一看就乐了,说:“你命真大,子弹横在你头上,居然没炸。”这个故事很快就传遍了部队。有一天2团几个首长来我们团,高成贵政委特意拿两个很大的烤地瓜,说来慰问我这个没有流血的伤员。

1948年,部队搞民主改选党支部,非党员也参加,向党员提意见。第10纵队宣传部长夏平同志参加我们支部的民主会。大家主要对我这个书记提意见,如关禁闭、骂人等。但是,第二天表决,我全票通过。晚上我找组织股长孙志忠同志,要求让我当副书记。后来,夏部长找侦察员苗玉留谈话。苗玉留说:“她确实关过我禁闭。因为一次我执行任务很晚回来,炊事班老班长没有给我留饭,为此我恨老班长吵了起来。她叫通信员把我关到她办公室里面的屋子里,实际上是她的卧室,让我先休息。同时又去做老班长工作,给他讲我们侦察员的工作有多辛苦。老班长感动得哭了,急忙给我做了面条,还向老乡借两个鸡蛋煮了给我送来。您说这叫关禁闭吗?”最终,孙股长通知我:“按民主规定,书记还是你。”我非常感动,从此改掉了骂人的毛病。

2013年8月7日,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西宁拉开了序幕,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诗人参加了盛会,著名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和美国诗人西蒙·欧迪斯获得“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”,自然成为了焦点人物。

中西诗人不再分彼此了,统一分成几个组奔赴朗诵会场。一天下午,我和阿多尼斯分在同一个组,诗歌朗诵会设在西宁市青少年宫的厅厅里。《世界文学》主编余中宪串主持人,他第一个邀请阿多尼斯朗诵。83岁的诗人慢慢上台,掏出诗集《时光的皱纹》,用非常细腻的声音,开始朗诵。这是近乎喃喃自语的吟哦,其实是诗人在与灵魂对话。在非常安静的语境里,突然飞起一声“卖麵包谷哟——”的吆喝,那是一个小贩,看见这里人多以为有机可乘。阿多尼斯自然不明白“卖麵包谷哟”的民间生存原则,他沉默了几十秒,大家安静下来,他又回到了低声倾诉。但是,“卖麵包谷哟!”再次执拗地响起,诗人不快了,他垂手,放下了诗集:“不喜欢诗歌的,可以出去!”主办方也大声干涉小贩。这大大影响了诗人的情绪,当他再次展开诗集读了两句后,卖饮料的吆喝声又不清自来……

阿多尼斯向大家鞠躬,说,我不朗诵了。回到座位上。他可能有很多不理解,在他忧郁地斜视厅厅里的广大“诗歌看客”之际,我按动了快门。



蒋蓝/图文

